

校方、教師與家長應如何攜手應對學生行為問題

駐休士頓辦事處教育組

過去 30 年來，全美教育界對於如何管理學生的主流觀點歷經了劇烈轉變，無論新進或資深教師皆面臨學生行為日益惡化的困境，包括態度粗魯、缺乏尊重、不願完成課堂作業，甚至對同學及教師行使暴力等。

根據 EdWeek 研究中心的「教學現況計畫」(The State of Teaching Project) 調查結果顯示，在全美超過 5,800 名的教師受訪者中，有 35%認為與 2025 年相比，學生的行為表現「惡化了許多」，認為學生行為有所改善的教師則少之又少。

為何校園不良風氣漸長？

1. 修復式教育成效有限

自 1990 起 2010 年間，「零容忍」(zero tolerance) 一度成為美國教育界主流政策，主張應明確區隔違反校規的學生應與遵守規範的學生，並針對違規者處以校外停學 (out-of-school suspension) 或轉至替代教育機構就讀的嚴厲處分。然而研究顯示制度經常未考慮學生的社經地位差距，導致非白人學生及身心障礙生受懲處的比例往往高於白人學生。

近年來，許多學校採取「修復式教育」(restorative approach) 的溫和作風，透過衝突調解、修復式對話及校內停課 (in-school suspension) 等措施化解衝突，讓學生能盡可能留在校園中學習而非被直接排除，雖然更人性化且具包容性，但成效仍相當有限。許多教師也批評此類懷柔政策令學生幾乎不必承擔違規行為的後果，無異於放任其逃避責任。

2. 新冠疫情的後遺症

新冠疫情期間，學生因不必到校上課，自然毋須遵守一般校園規範及作息時間，這種習慣在疫情後仍持續造成影響，學生不僅失去與同儕及教師互動的能力，更花費過多時間在缺乏監督的電子產品活動上；此外，學生的閱讀及數學能力皆落後於疫情前應有的年級水準。

芝加哥 Nicholson 數理學校 (Nicholson STEM Academy) 資深特殊教育教師 William-Halls 指出，許多學生之所以表現出不當行為，其實是為了掩飾在學業上受到的困難與挫折；喬治亞州 Greenville 中學 (Greenville Middle School) 校長 Mike Perry 則表示：「學生因缺乏在受挫時妥善調適的能力，導致情緒經常瞬間失控，我們必須有意識地重新建立學校的運作規則，並明確告知學生哪些行為才是可以接受的。」

3. 家長過度介入

有教師指出，學生出現不當行為後會試探自己能否全身而退；家長參與本應是與學校共同改善學生行為的正面因素，但現實是當校方祭出停學、留校察看，或禁止參與課外活動等處分時，家長往往出面袒護，不僅讓學童免負責任，也使校方威信及管理成效受損。

夏威夷一所高中的科學暨技術職業教育教師 Whitney Aragaki 表示：「家長容易將教師對孩子行為的反應，錯誤解讀成對自身教養方式的批評，進而產生防衛心理，也讓彼此更難找出導致孩子出現偏差行為的主因，但事實並非如此。」William-Halls 則表示：「當你致電家長要求他們和孩子談談，或請他們到教室提供陪伴時，不是聯絡不上，就是得到負面回應。家長會認為你在批評他們的孩子。但老師們只是希望能獲得支持，一起幫助孩子改變。」

如何導正學生不當行為

1. 學校行政人員應擔任協調者並提供支持

根據「教學現況計畫」的調查，近半教師表示學校管理層如能在教師處理學生紀律問題時提供支援，將會對課堂秩序管理產生重大幫助。然而學校行政人員除須在家長、教師產生衝突時進行協調、維持彼此信任關係，也要確保違規學生承擔相應後果，有時難以對教師提供毫無保留的支持。

美國德拉瓦州 Newark 市 Hodgson 職業技術高中 (Hodgson Vocational Technical High School) 副校長 Rahsheem Hollis 表示：「作為經常面對家長怒火的第一線人員，我了解有時家長並非刻意針對，只是想發洩情緒並渴望被傾聽，因此我會邀請學生、家長與教師進行

多方會談，讓每個人都有機會說明自己的觀點。」

Perry 校長也曾多次在家長與教師之間扮演協調者，他表示：「家長常會替孩子的行為找藉口，教師則必須堅守立場；但學生的行為反常往往事出有因，比如正在經歷失去至親的巨大傷痛等，因此學校需要了解情況並讓專業輔導人員提供必要支持。我們希望教師把行政團隊視為盟友，卻也不能因學生的行為問題就將其全部停學，即便最終結果未必人人滿意，但遵守程序並讓教師參與溝通與解決問題的過程，能讓他們感受到校方支持其專業判斷。」

2. 校方、教師、家長應及早介入並攜手合作

根據調查，有過半教師認為應該限制家長對學校執行管束的干預，以對改善學生行為產生「重大積極影響」；縮小班級人數也被列為更能有效改善學生行為的措施；另有 58% 的教師認為，家長本身需接受相關培訓，了解如何教導孩子在學校中表現適當行為；此外，校方行政人員更應在學生產生問題行為的初期就及早介入。

威斯康辛州朝聖者公園中學 (Pilgrim Park Middle School) 副校長 Elizabeth Nelson 指出：「我們必須善用資料預先辨識需要特別關注的學生，以本校為例，2022 至 2023 學年度我們約有 900 名學生，卻累積了 822 件轉介 (referrals) 紀錄，即須讓專業團隊介入處理學生行為。其中有近半案件都集中於特定 20 名學生身上，為改善情況，我們找來這些學生的家長進行會談，建立共同合作基礎。會談後，學生的轉介記錄在 2022 年至 2024 年下降 40%、校內停課減少 59%，校外停學則大幅下降 69%。我們鼓勵教師改變想法，與家長共同討論學生行為。父母終究是孩子最堅強的後盾，但有時家長不是故意要為難教師，只是因為他們自己也承受著壓力。」

3. 提供教師更多專業培訓

William-Halls 表示：「由於教師流動率偏高，我是校內少數接受過修復式對話 (restorative conversations) 培訓的教師，我認為新進教師尤其需要接受這類專業培訓，以增加其管理課堂秩序、處理學生行為問題及與家長溝通的經驗與技巧。」William-Halls 建議校方可透過系統化的真實情境演練，協助教師將抽象的社會情緒學習 (Social-

Emotional Learning, SEL) 落實至日常教學；Perry 校長也指出：「我們致力於建立正向校園文化，將社會情緒學習融入教師的共同備課時間與培訓中，以增加師生、家長間的積極互動。」

撰稿人/譯稿人：賴晏如

資料來源：2026 年 3 月 4 日 Education Week 電子報

<https://www.edweek.org/the-state-of-teaching/2026/leadership/teachers-say-behavior-problems-arent-just-about-students-its-the-parents>

AI 協作：本文採用 AI 協作，由 ChatGPT 摘譯及分析資料，經核對及綜整而成。

